

## 第一章 少年时期

### 长沙读书

我于一九〇七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溪口的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里，幼年在乡村读过一年私塾、五年小学，一九二一年到省城长沙考入长郡中学。当时正是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时期，正是各个帝国主义勾结各地军阀进行内战的时期，连年战争不息，灾祸频仍，真是民不聊生，国亡无日。

我国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，爱国之士，大声疾呼，号召青年起来从事救国运动，我在长郡中学两年半的时间里，受救国思潮的影响，成为一个积极分子。那时湖南成立了学生联合会，会长是夏曦（以后才知道他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，他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，随后在长征途中溺毙）。学生会常召集各学校的积极分子开会，讨论进行宣传和组织游行示威等活动，我曾参加过多次。我在学校的国文教师熊亨翰，对我的作文颇为赏识，常给我打九十分或一百分，有时甚至把我的作文贴在学校公告栏内供大家阅览。这并不是我会写文章，而是因为我的作文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愤懑，洋溢着爱国热情。我和同级同学曾三（湖南益阳人，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过长征）意气相投，两人合作在校创办了一个《雷声》墙报，张贴在学校公告栏的旁侧，有几位热心的同学帮助写稿，这些作品充满着对时事的悲愤。一九二二年，湖南当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、庞人铨，我们在《雷声》上作了猛烈抨击，许多同学都为我们捏一把汗，有些人劝我们不要这

样搞，恐有被捕杀头的危险。幸得学校一些师生的同情和支持，我们才没有遭到迫害。

## 到广州去

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，于一九一一年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，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。但是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，既没有得到最广大的农民的支持，也没有摧毁旧政权最大的支柱——北洋军阀体系，所以这次革命的果实，很快就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。孙中山号召继续革命，但多次都失败了，到一九二〇年他受到一部分地方军阀的拥护，在广州获得一个立足点，设立军政府，孙中山任总裁。到一九二二年八月孙所倚重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勾结，背叛孙中山，孙被迫离粤赴沪，随后拥孙的各部，声讨陈炯明，向广州进军，陈被迫率部退据东江，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重返广州，就大元帅职。孙在未回粤以前，曾于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与列宁特派的苏联代表越飞晤谈，并发表联合宣言，回粤后，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，得到了广大人民和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，都把广州看成是祖国前途希望的象征，我脑海里也产生了到广州去参加革命的念头。但人生地不熟，又无路费，怎能去呢？心中殊为苦闷。不料事有凑巧，在一九二三年冬快要放寒假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熊亨翰老师（湖南益阳人，长郡中学国文教师，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积极从事革命工作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，熊在武汉被捕，在汉阳鹦鹉洲英勇牺牲）找我去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我平时看你的作文和言论，富有爱国热忱，现在广州派人来湖南招收一批青年去受军事训练，你想去吗？”我听了十分兴奋，连答了几声“愿意去”。于是熊老师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，叫我去某地接头，很快就报上了名。过了几天通知我们于某月

上午八时到育才中学去参加考试，我照熊老师的指示按时去了。

考试完后，主考者叫我们等通知。大约过了五、六天，我被通知录取了，并囑于某天去育才中学集合。我按时前往，见参加考试的一百多人绝大部分都被录取了。一位年约三十左右，身材瘦长的人对我们讲话，大意是：广州现在是革命根据地，由孙中山先生领导，大家抱着爱国热忱，愿意远道去粤（当时粤汉铁路只通到衡阳，去广州要绕道武汉、上海、香港），革命政府欢迎你们去。但革命政府还很穷，不能发给路费，需要你们自筹。这次来湘招生是秘密的，你们不要对外声张。大家可以分批走，三、五个人，十几人一批都可以。大家自行组合，但务于半月内动身，到广州后会有人招呼你们的。”

听完讲话，我满心喜欢，首先去告诉我的二哥宋俐初（他那时在长沙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），他听了我的话，认为我这样小的年纪（那时我还未滿十七岁），要千里迢迢到广州去，简直是荒唐，责备了我一番。那时已放寒假，他给我两块光洋（即银元）囑我日内就回家乡去，而我则坚持要去广州，两兄弟争吵了几个小时没有结果。第二天，我去见在湖南财政厅当一级科员的叔父宋黎，告诉他这件事，一开头他也认为路太远，不宜去。而我则坚持要去，并恳求叔父为我筹借光洋三十元作路费。叔父见我态度坚决，答应考虑，过了两天，叔父叫我去，二哥也在，叔父对我说：“你既然坚持要去，我们答应你，为你筹措了三十五块现洋作路费，你要找几个好伴一道走，路上要小心谨慎……”真是千叮咛、万嘱咐，我内心既感激又兴奋。第二天我首先去找陈赓，他和我同县，是在育才中学考试时认识的。我们一见如故，很谈得来。他曾告诉我，他是湘乡柳树铺的，离县城十五华里，曾在县城东山高小读过一年多（一九〇九年，毛泽东主席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；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湘乡东山书院，是清朝末年废私塾、兴学校的时候创办的），随后在湘军鲁涤平的部队里当过几年兵，觉得没有意思，才又到长沙来进学校。我们约好了

一道走，我还找了长郡中学的同学刘进、史书元等人，商定了启程日期。我们一行二十余人，公推陈赓当领队。

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下旬的某天下午四点左右，我们穿着湖南青年学生装，每人带着一个行李包，先后来到了小吴门车站。陈赓把车票发给每一个人，然后大家陆续上了从湘汉铁路去汉口的火车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肮脏污浊，拥挤不堪，这是四等车，票价较廉，据说是专供穷苦人坐的。五点左右，汽笛声不断吼叫，火车缓缓地开动，向北驶去。我们怀着依恋和兴奋的心情，离别了可爱的故乡——湖南长沙。

第二天正午到了武昌，我们随即过江到汉口，住在长江边一家三等旅馆里。入夜后，有打麻将的，有抽鸦片的，还有卖唱的，各种声音同鸦片烟的气味交织在一起，令人恶心，几乎被吵闹得整夜不能入睡。这是我离开家乡后，初次踏入社会的印象。

在武汉住了两天，我们又乘船东下，坐的是统舱。所谓统舱，就是在轮船的下层，睡地板，没有床铺。一路上风平浪静，我们一行十余人每天立在船板上饱览两岸风景，真是山河壮丽、田野肥沃。我们感到十分兴奋，觉得这次出门真是大大地扩大了视野。陈赓曾慨然说：“我们的祖国是这样的秀丽，自鸦片战争以来，被外国人践踏得一塌糊涂，这些强盗们还想瓜分我国，要叫中国人做亡国奴，我们青年必须努力革命，起来打倒列强和国内军阀。”大家对他的话，表示由衷的赞同。

抵达上海后，我们住在靠黄浦江边的一家客栈里，这是一栋中国式的楼房，虽然是属于三等旅馆，倒也整洁清静，较汉口时好多了。上海大部分地方被帝国主义辟为租界，所谓十里洋场，表面上看来很繁荣，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，例如贩卖鸦片、贩卖军火、贩卖人口……等等，无不由此而产生，实为一切罪恶的渊薮。大家对这个十里洋场存有戒心，不敢随便出去逛。我们在上海只住了几天便乘船去香港，到港后只停留了几个小时，即换船去广州，大约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中旬抵达广州的。